

政德镜鉴

他天生一副铁傲骨，为官不依附朋党，颇有政声。他斥东林、劾阉党、忤帝王，对事不对人，虽仕途跌宕，罢黜再三，初心依旧。

社稷倾覆、国破家亡，回天乏术之际，他用末路抉择为人生和时代，添镌了一笔悲壮的注脚。

# 高弘图：骨鯁孤臣的末路抉择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  
本报通讯员 隋丽君

九月末的胶州，夏秋之间的角力和缠绵仍在继续。放眼而望，四处可见可喜的翠绿，但不断飘落的枯叶，似乎又宣示着秋季的终将胜出。

在明末清军攻打胶州时，曾有一名罢官归乡的官员挺身而出，保家守土。他用行动和抉择，昭示了骨鯁之臣的品性和操守。

“高弘图居官清正刚介，曾数次触怒君王，蒙冤罢官。居乡十年，他未有怨言。清军入侵，他毁家纾难，招募乡勇，组织抵抗。后来他流寓江南，组织南明朝廷，渴望中兴明室。无奈明朝积重难返，任他苦心孤诣，依旧回天乏术。南京城破后，高弘图避世古庙，绝食而亡，显示了高尚的民族气节。”胶州市政协专职常委石业华说。

## 澄清吏治，风裁肃然

高弘图的官声政德，和良好的家风家教息息相关。

明神宗万历十一年（公元1583年），高弘图生于胶州一户书香门第人家。

父亲高梦说，是当地颇有声望的秀才。父亲幼年清苦，常常食不果腹，生活非常拮据。但艰难困苦的生活，反而砥砺研磨着他的毅力。高梦说力学不辍，秉性端严，曾有寡妇慕念他的卓犖风姿，私下派遣奴婢送来贿赂，相约半月夜下私会。高氏推辞贿赂，婉拒请求，终生未泄露寡妇之名，乡人德之，称其为柳下惠乡贤。

高梦说对儿子要求严格，督促学业寒暑不断，加上高弘图聪颖好学，学问日益增进。万历三十八年，27岁的高弘图，中进士第三甲，与名臣钱谦益和明末重臣杨嗣昌成了同年进士。

中进士后，高弘图授官中书舍人，掌管诰敕、制诏、银册和铁券的书写。因为他办事兢兢业业，不肯与上司同流合污，不久便被任命为御史。

天启元年（公元1621年），高弘图受命巡按陕西，勘查当地的吏治优劣。他人陝后，细加访查，逮捕煽动百姓作乱的奸人，并揪出他们在官府的内应。

当地藩王府的太监张清，倚仗权势的庇护，横行乡里，欺压良民，百姓有苦难言。高弘图访求得到详情，不顾藩王的说情，将太监张清收捕下狱，并上疏坚持将其正法，以儆效尤。

藩王和太监，是明代臣子不敢触碰的雷区。高弘图官微言轻，却不畏权势，惩治不法，令当地豪强畏惧敛迹。接着，他又大刀阔斧地改革吏治，迅速扭转糜烂的政治风气，赢得百姓的交口称赞。一时间，陕西之地“吏治澄清，风裁肃然”。

明末的御史，是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。他们掌握监督大权，可以风闻言事，朝臣忌憚不已，争相拉拢。一些御史面对权位诱惑，放弃为官操守，依附朝臣或宦官，沆瀣一气，结为党羽。高弘图自担任御史，便立誓远离泥

淖，绝不结党营私、党同伐异。

但在党争激烈的晚明，意欲独善其身往往不能得。高弘图希望不偏不倚，灾祸却自己找上门来。

明熹宗即位时，朝廷形势动荡不安。关于遗孀李选侍是否“移宫”居住，朝堂内部争执不休。御史贾继春听信了谣言，上了一道奏折，批评主张移宫的杨涟和左光斗等人。奏折呈递后，激怒了刚登大位、盛气凌人的皇帝。熹宗对贾继春下旨严厉切责，并表态要严肃惩处。

高弘图闻听此事后，认为贾氏所为仅为小过，若要严惩并不妥当。为此事定性分析后，他不顾皇帝的盛怒，和御史张慎言一起，上折为贾继春求情，尽力弥合与杨左之间的裂痕。没想到熹宗览奏后却愈加愤怒，将奏章交予廷臣议论，要把众人一并定罪。好在吏部尚书周嘉谟是官场老手，从中打圆场解劝，为他们尽力开脱。周氏规劝道：“我认为贾继春所言，应是误听传闻所致。而高弘图和张慎言，连疏读奏，只是为了平息此事，本意无他。皇上天性仁孝，对臣子的过失定会宽宥的。”在阁臣的搭救下，高弘图等人被判了夺俸两年。

经此挫折后，高弘图并未灰心丧气，走向消沉。他更加深刻思考当前局势、朝政之弊，上疏陈述“时政八患”，请求起用颇有人望的邹元标、赵南星等人。

## 孤棧自持，不依丽人

晚明党争激烈，有齐、楚、浙等林立的朋党，进入了非此即彼的怪圈。进入官场，往往要认籍贯、拜码头，入某朋党，这样才能获得大树荫蔽，好在官场游刃有余。但高弘图无所依附，只是居中调和，起先举荐过东林党的赵南星，也搭救过非东林党的贾继春，尽量维护着表面的和谐。

但在高弘图巡按陝西后，赵南星却上疏弹劾高弘图，令高弘图免官回籍，心中难免愤怒和怨恨。但高弘图依旧信守自己的原则，在朝中各党派之间从不依附。

后来魏忠贤整合齐、楚等党人，组建起声势浩大的阉党，专门和东林党相抗衡。他认为高弘图和赵南星有矛盾，可以委以重用，便矫诏召高弘图。高弘图进京时，杨涟、左光斗等人已经被关进收押软禁的诏狱，连番刑讯拷打，十分严酷。高弘图立即上疏，为杨左等人求情，他说：“既然国事是非如今已经明了，就应该为国留才，雷霆之击不宜太多太广……诏狱中关押的大臣，其罪行和生杀，应由司法部门来定夺，部分官员的做法有所偏颇。”批评的矛头指向了魏忠贤。魏忠贤知道高弘图上疏为六君子求情，并指责自己后，愤怒懊悔不已。

当时魏忠贤一面兴起大狱，铲除朝中的反对者；一面怂恿熹宗不理朝政，游乐嬉戏，以便自己更好地控制权力。高弘图见国事日非，边疆日危，皇帝却耽于安乐，忧心忡忡。他拟就一份奏疏，规劝皇帝要悬崖勒马，勤政爱民。在奏疏中，他援引西汉光禄勋张猛的故事，暗指魏忠贤的胡作非为。

西汉时，元帝去宗庙祭祀，本来是乘车从

灋桥前往，在太监的怂恿下临时起意想乘楼船前去。皇帝变更行程，往往大费周章，劳民伤财。包括御史大夫薛广德等众多官员一再谏阻，却仍无效果。光禄勋张猛含蓄地指出：“君主不宜轻易蹈入危险的境地。陛下万金之躯，关乎宗庙社稷。乘坐楼船，若遇风浪，恐有危险，不如乘车。我还听说，如果君王圣明的话，臣子自然也很耿直。”元帝听后脸色和缓，便乘车前往祭祀。

张猛的劝谏，委婉而周密，得元帝“循循善诱”的褒奖。高弘图引述此事，为的也是起到良好的规劝效果。魏忠贤奏罢后，却极为愤怒，他假托皇帝名义发布诏书，严厉批评了高弘图。

皇帝的切责和怒火，没有让高弘图畏惧退缩。后来熹宗巡幸东郊，高弘图又出面谏阻，并揭露陝西巡抚乔应甲的罪行，指责工部尚书崔呈秀的胡作非为。崔呈秀、乔应甲都是阉党的骨干成员，魏忠贤因而怒不可遏。朝廷本拟让高弘图出任顺天巡按，魏忠贤却从中作梗，另用他人。

当时阉党专权，势倾朝野，对不附己的官吏，动辄横加罪名，任意逮捕。魏忠贤矫诏逮捕了都御史周宗建和吏部主事周顺昌。高弘图立即上疏，洞指阉党其奸。接着他又上一道奏疏，认为“请宽刑狱，反对酷刑”。

三番两次的交锋后，魏忠贤认定将高弘图收为已用已经不可能。高弘图见国事不容贤人，也心灰意冷，萌生了退意。他上疏乞骸骨，自请退职回乡。魏忠贤也顺势让他回家闲住。

## 贰尚书，非贰内臣也

崇祯元年（公元1628年），权倾朝野的魏忠贤走到了生命的尽头。在崇祯的反击下，他先被罢官，后畏罪自缢。此前受其牵连的官员，纷纷复职回朝。

高弘图自胶州赴京师后，立即弹劾阉党余孽，廓清朝堂的风气。崇祯二年，高弘图升任太仆寺卿，很快又任左副都御史。

虽然历经仕途的跌宕起伏，高弘图“骨鯁”的品性依旧没有改变。对于为非作歹者，他主持正义，弹劾不休；对于蒙冤受屈者，他不避逆鳞，上疏搭救。时任刑部尚书乔允升，以“清廉正直，执法不挠，政绩卓著”而闻名于世。崇祯初即位，魏忠贤虽然获罪身死，但其党羽依旧遍布朝中。皇帝让大臣审理余孽，众人皆畏俱推辞，唯77岁的乔允升说：“此国事也，何避？”他据实审理，按七等定罪，毫无假借，人心大快。

第二年，后金几十万精兵从喜峰口攻入关内，逼近京师。在押的囚犯170余人，在刘仲金的鼓动下，砸碎刑具，越狱逃脱。崇祯震怒，将乔允升缉捕，准备定为死罪。

都御史易应昌认为乔允升不宣判死，便和皇帝几度交辩。崇祯怒，将易应昌也逮捕入狱。高弘图对这种处理，并不认同，被崇祯降级处理。皇上亲自诘责高弘图，认为其与易应昌等人结党。结果，是崇祯最为忌讳的话题，群臣闻听后脸色大变，惊讶失语。高弘图却说：“臣来自田间，不知有党，党亦不知有臣。”不久高弘图又上疏，认为乔允升罪不当死，应当戍边，不然虽死也不敢奉诏。经过高弘图的刚直和力争，乔允升和易应昌终于免于死罪。

崇祯五年，高弘图擢升为工部侍郎。当时太监张彝宪备受宠幸，奉旨督查六部事务。他听说高弘图忠直刚介，想和他攀交情，结党援。张彝宪到工部后，高弘图只是与他叙主客礼，并不趋炎附势，有所巴结。后张彝宪召集侍郎议事，高弘图称疾不赴。

不久，高弘图上疏崇祯，对太监稽查六部事务提出异议：“工部有办事公署，中间坐尚书，左右两旁分列侍郎，这是礼制的规定。内臣张彝宪奉圣旨之命，就俨然凌驾于众人之上，不是辱没了朝廷褻渎了国体吗？臣之为侍郎也，贰尚书，非贰内臣也。国家大体，不能不慎重，所以仅仅以宾主之礼对待，虽然拂了他的脸面，也不是我的本意。”崇祯接奏不听，坚持要求太监在公署商议其事。倔脾气的弘图便七次上疏，声称自己患病请求去职。崇祯严察刻薄，此时更大怒不已，将他一撸到底，削籍革职。

高弘图翩然而去，声名却日益加重，居乡十年，言官交替举荐。南礼部主事周讷便为他鸣冤叫屈：“内臣任用方便，而舍弃却难……今内臣张彝宪用，高弘图这样的骨鯁之臣就不可容了。”

## 寄身于中兴大业

高弘图归乡后，原本想效仿古代的隐士，藏身山林，不问世事。他遁入林泉，杜门不出，只是潜心著述，好似世态炎凉已与己无关。

居乡十年，少了官场的波云诡谲，倾轧欺诈，多了乡野的轻松写意，凝神静气，高弘图的学术研究进入了旺盛的喷薄期。他先后完成了《易经著解》《史记论事》，杂文类的《纲目别见》《论史》，道家类的《老子解》，杂家类的《高弘图杂著》《高弘图尺牍》《血衣记》等著作。

惬意的乡居生活，终于为战乱所打破。崇祯十五年，清兵绕开重兵防卫的北京，南下进攻河南和山东。在山东境内，清兵长驱直入，兵锋直指胶州。危难之际，归隐在籍，断绝仕心的高弘图，立即换了一副模样。他变卖田产，毁家纾难，招募乡勇，组织抵抗。高弘图火速驰赴县城，与在籍参将谈震采，协助知州郭文祥巡城坚守。高弘图在城内张榜安民，勉励将士，鼓舞士气，稳定了形势。在他的苦心经营下，胶州得以保全。

第二年，国势日蹙，崇祯开始想念居乡的高弘图。听说他辅佐守卫胶州有功，便召喚至京师，询问以时事，任命他为南京兵部侍郎，不久又升为户部尚书。

当时明朝已命悬一线。保住江南膏腴之地，是中兴明室的唯一希望。高弘图上任后，与史可法配合默契，兢兢业业经营着江南一带。

崇祯十七年，李自成率农民军攻陷北京，崇祯自缢于煤山。史可法和高弘图闻讯京师被困，忧虑万分。两人商定，史可法立即起兵北上勤王，高弘图则负责由长江运送粮草至淮河接济。勤王部队刚出发，崇祯死难的消息便传来。

国家不可一日无主，史高二人立即和陪都南京的大臣商议立君之事。史和高认为，如果没有英明的君主即位，就难以安定如今的乱局。

正当南京众臣遴选君主之际，凤阳总督马士英由南京返回驻地。他意外获悉，属下部队的将领和部分太监，已经酝酿推举无德声的福王朱由崧为帝。马士英为了避免动乱，攫取策立元勋的功劳，立即转变了此前赞同史可法的态度，同意拥立福王。

马士英违背初衷，令史高二人气愤交加。为了安抚高弘图，福王命他为礼部尚书兼东宫大学士。高弘图一再推辞，最后以推荐姜曰广入阁为条件就职。

福王即位后，立即暴露本性。他贪图安逸，丝毫没有恢复故土的念头。高弘图日夜幽愤，苦口婆心地劝谏，也起不到任何作用。后来他为振奋朝廷精神，上疏提出将都城迁移到中都凤阳，再北上收复山东，向天下显示讨贼安邦之意。可福王留恋江南美景，竟不能听，高弘图只能坐着看好河山沦为敌手。

高弘图又上“新政八事”，以宣威信、勤圣学、收人心为重，徐图恢复。这次的“务虚”之举，得到福王的采纳。但因为马士英等人的阻挠，“新政八事”也是有名无实，从未实施过。

南明建立之初，因高弘图德高望重，朝廷的重大决定多由其来拟定。高弘图清正立朝，对君主的过分要求也不予同意。官中传出福王手札，说要任用户部侍郎张有誉担任尚书。高弘图知张有誉无能，难以胜任，便缄封退还，还写奏本极力谏阻。在高弘图的坚持下，户部尚书的人选最后以朝臣推荐方式决定。南京宦官要求重新开设东厂，高弘图鉴于以往的阉宦之祸，力争谏阻却未能成功。

为了安抚高弘图，福王加封他为太子少师，改任户部尚书，后来又任太子太保。

马士英在朝中擅权作福，能与他对抗的只有史、高两人。史可法手握兵权，马士英便唆使福王将他派往前线巡视四镇，用四镇的将领来掣肘他。这样一来，内阁中枢仅有高弘图一



高弘图画像

人，独木难支孤掌难鸣。高弘图也发现，自己所提的建议，越来越得不到重视。

马士英为清除异己，便大起“逆案”，以株连朝中的清正大臣。高弘图目睹社稷危殆，多次力谏无休。高弘图见国事日非，便上疏请求召史可法入阁，意图制约马士英。奏疏上递后，却被马士英矫诏切责。高弘图心力交瘁，巨大的挫败感围绕四周，不禁萌生退意。

## 天之丧明，徒苦江东父老

因言不得用，高弘图上疏请求辞职。鉴于他是元老重臣，福王只是让他请假在家养病。高弘图后来福王又派太监请高弘图入朝议事，高弘图再次引疾乞休：“臣不敢轻易离去，只是用人之事，臣觉得此人可用，而勋臣却觉得不可用。如此是非混淆，黑白难分，臣又怎能继续在位呢？”福王极力挽留，难地地对他说道：“国事刚有眉目，您为何忍心离朕而去！”

福王虽然不愿高弘图离去，但却不能亲贤臣、远小人，高弘图的治国策略依旧不能用。高弘图终于心灰意冷，绝意远离官场，遁入江湖。此后高弘图连续四次上疏乞归，终于得允。福王赐他白金、禄米，持节护送，但廉介的高弘图坚辞不受。

辞官后，高弘图起初想回到故乡。但此时山东残破，胶州故居已经片瓦不存，他只能流寓江南，四处漂泊。

不久，清军南下，进攻南明。史可法虽督师扬州，却处处受掣肘，形势危如累卵。扬州城破，史可法殉国，江北三镇内江作乱，风雨飘摇的南明小朝廷，顷刻土崩瓦解。

镇江失陷的消息传来，高弘图满脸忧愁，更加愤恨。虽已没有了官职，且年过花甲，他依然四处奔走，劝说各路将领奋力抗清。他起先来到浙江，劝说魏抚张秉贞坚持抗清。但张秉贞却口不言兵，不为所动。

无奈之下，高弘图又赶到浙江总督张凤翔处。张凤翔此时停泊在钱塘江上，高弘图登上其船。谈话间，高弘图向张凤翔建议将福王迎接到此，清君侧，献奸臣人头，再暂时与清兵和议；接着再犒赏部众，鼓励士兵，稳固后方。高弘图数番劝说，张凤翔虽然认为此计很好，却始终不敢领命。

高弘图只好渡江来到绍兴府，安排好家人。接着他折返杭州，可惜事已不救，接着入绍兴城，想和刘宗周商议时局。可惜刘宗周已经绝食二日，不愿意再见客。他写手书送给高弘图：“故相为其难，某为其易……某何面目复见天下士乎。”

坏消息一个接一个传来，明室中兴的梦想彻底破灭了。高弘图回天乏术，终日泣涕不已，感叹“天之丧明，徒苦江东父老”。清帅多铎闻高弘图之名，写书信以召之。高弘图收信而不启书，托幼子于故友谈迁。二人凄然话别后，高弘图逃至会稽竹园寺中，人乞一面不可得，每日惟一餐祈死，最终绝食九日而死。死后，孤孙将他的灵柩扶送回故里安葬。

高弘图去世后，监国的鲁王褒奖他的气节，赠为太师，谥号“文忠”。清初的全祖望，在闻听高弘图殉节后，与绍兴太守商议为他立祠祭祀。当地百姓闻听高弘图去世，悲哀不已，泣涕涟涟。

“高弘图与奸臣同朝，不激不随，持守正直。如果在清平之世，他注定会是一个贤良的宰相，辅君致太平。但他生在动荡不安的乱世，无力只手补天，只能以殉节的方式保全民族气节。所以全祖望才说，若没有高弘图的气节，南明只是一个污秽之处而已。”石业华说。

不久，清军铁蹄南下，蹂躏江南之地。镇江沦陷的消息传来，谈迁便跟随高弘图四处奔走，力图保住江南半壁江山。他们向各地调兵自重的将领，申明保家卫国的重要性，恳请他们迎接弘光，继续组织反清力量。但这些降将领畏首畏尾，毫无主张，只是拥兵不前，坐视国土沦陷。

弘光政权灭亡以后，高弘图心如死灰，不再对复兴明室抱有希望。他将家眷委托给谈迁照顾，自己逃入古寺，绝食于浙江绍兴。不久，张慎言也病死在了安徽宣城。谈迁中兴明室的愿望彻底破灭。他回到海宁家中，做起了深居不出的遗民，“无户外之履”近十年，专以著述为务。

谈迁结识高弘图，对他的史学写作大有裨益。他在南京作高的幕僚时，曾遍览南都内阁中的所藏图书，并收集了大量的明朝遗闻。高弘图曾赞许他“有书癖”，“见载籍文字，辄变而喜。谈迁把在南京读书的笔记，辑集成著作《枣林杂俎》。这部笔记，对于福王政权朝臣分立门户，结党倾轧；福王朱由崧的沉迷酒色，不理朝政等腐败现象作了不少揭露，同时也记载了清兵南下时马、阮集团的成员们或降或逃的史事，也有一部分民族气节的南明官员抗击清兵，以身殉国的史事，极具史料价值。

## ·相关阅读·

他曾怀抱中兴明室的殷切期望，也曾入高弘图的幕府，为中兴大业出谋划策。但在残酷的现实面前，他萌生避世之心，

将满腔的热情付诸于史学事业，结出了灿烂的史学硕果。

# 谈迁：结识高弘图，戮力著国史

□ 本报记者 鲍青

在高弘图的晚年岁月里，著名史学家谈迁的地位非常重要。高弘图临终之时，将家人托付谈迁照顾；而谈迁也因结识高弘图，得以参与中兴明室之业，并遍览南都藏书，史学研究大有增益。

谈迁和高弘图的结识，和崇祯十五年（公元1642年）的胶州之乱密切相关。清军绕过北京，进攻河南山东。当时因触怒崇祯削籍居乡已经十年的高弘图，毁家纾难，组织抵抗，保全了胶州全城。崇祯闻高弘图抗清事后，将他擢升为南京户部尚书。高弘图上任不久，就结识了谈迁。高弘图和张慎言，初见谈迁皆“以为奇士，折节下之”，并“相与为布衣

交”。两年之后，李自成率起义军攻入北京，走投无路的崇祯无奈自杀。当年的五月初，陪都南京的众臣迎福王朱由崧监国于南都，半月之后正式称帝，建立南明弘光政权。

德高望重的高弘图入阁理政，谈迁也入高弘图幕府充当记室。福王在登基之初，谈迁愤慨于神州陆沉，曾对“中兴方始”有过美丽的幻想，对弘光政权寄以莫大的希望。为了整顿朝廷纲纪、收揽人心、抵抗清兵南下，收复中原失地和镇压起义，他曾积极向高、张等人出谋划策。他甚至还为兵部尚书史可法起草过慷慨激昂的誓师檄文，意图恢复明朝政权。

但是，弘光政权自打诞生之日，便被腐朽和没落所笼罩。弘光耽于酒色，不理国政，不知军国大计为何物，对恢复故土毫不挂怀。朝

臣们没有吸取天启、崇祯时党争的教训，依旧分立门户，互相倾轧，内斗斗气愈演愈烈。而在外的领兵大将如左良玉和江北“四镇”又拥兵自重，军阀习气浓厚，拒不听从朝廷节制，形同藩镇割据。面对这个四面楚歌却醉生梦死的小朝廷，谈迁的“中兴”幻想很快就走向破灭。

谈迁开始采取“避世”的办法，不再勉强自己置身泥淖。弘光朝建立伊始，对前线军事并不在意，反而下大力气搞修史等事务。它增设史馆，搜罗史臣入馆，准备修纂崇祯实录。皇帝对此事极为看重，将重任委托给了大学士高弘图。高弘图本来就赏识谈迁的史学才华，如今觉得正是才尽其用，便举荐他入馆修史。谈迁此时已经“心如死灰”，对南明朝廷的黑暗和史馆的艰难洞若观火。他婉拒道：“今日

史馆内众人，不务故土沦陷，平素动辄就好论尊卑高低。我厕身其中，也就是相当门下牛马走，对恢复故土毫无裨益。所以我宁愿藏身于瓮牖中，形同腐朽的草木，也不愿进入其中。”

接着，张慎言拟荐他任礼部司务，高弘图拟荐其任中书舍人。谈迁都推辞道：“迁，是个无用的老布衣了。如今社稷蒙难，国家不幸，难道我还要用它们来博取一个官职吗？”他一再推辞，坚决不上任。

谈迁不仅自己数番推辞，更多次劝说因掣肘于马、阮集团而无所作为的高弘图辞官引退。高弘图虽然位高，但在内阉中孤掌难鸣，处处受到掣肘，要求主张难以落实。高弘图也萌生了归隐之心，四次上疏请求去职。在他的坚持下，高弘图最终离开权力中枢，做了一名乡野孤客。